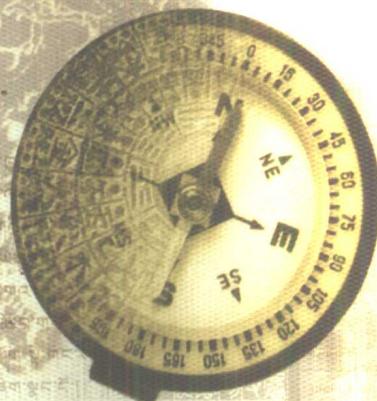


◎主编\许嘉璐\陈章太

Zhongguo
Yuyan
ne Zhongguo
Shehui



和 中
国 语
言 社
会

中国语言

■陈建民\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语言 和中国社会



■ 陈建民著
◆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陈建民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12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许嘉璐, 陈章太主编)

ISBN 7-5406-4027-8

I . 中… II . 陈… III . 汉语 - 关系 - 社会 - 研究 - 中国 IV . H1 - 05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东莞市凤岗镇天堂围区)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56 000 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7-5406-4027-8/H·54

定价 23.00 元

总序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成了推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一切学科，包括社会科学中的一些传统学科，都在思考自己如何投身到迅猛向前的科学技术的滚滚洪流中去。我们不能简单化地期望所有的学科都能为当今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人们能明显感觉到的贡献：有的学科旨在探索大千世界深层的奥秘，有的是民族文化传承与积累的延续；同时也应该根据习惯和已有的知识结构，去研究学科内容可能对今后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社会发展的速度加快时，特别是社会活动的中心——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时，生活就要向科学提出层出不穷、应接不暇的要求。能不能及时地意识到自身对于社会发展的使命，能不能主动地去满足这些要求，也就是主观世界能不能主动适应客观规律，将成为学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世界上的科学，经历了从综合到分析、从几门囊括古今天下事的学问分化为许许多多学科的过程。这个发展趋势符合人类对事物认识逐步深化的规律。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这一过程已经进行了几百年，人类由此所获得的益

FK68-37 15

处几乎无法计算。现在人类之所以能“上天入地”、“说东道西”，宏观宏到宇宙的形成、反物质的存在，微观微到质子、基因，就是得益于学科的分化和分析的方法。但是学术越发展，人们越是感觉到分化和分析的局限性，无论是从宏观的角度，还是从微观的角度，越来越需要不同学科的综合。其实，综合与分析是不可分离的。就在学术朝着分化和分析的路上大踏步向前走的时候，也并没有完全抛掉综合，只不过不够自觉，不是主要的趋向，影响没有像现在这样无所不在罢了。学术的综合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促成许多新的学科的出现，人类从中所获得的好处将更是不可估量的。

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关系越来越紧密和综合成为发展的主要趋势，当代学术的这两个特征，向学术界提出了挑战。在我国，过去几十年中所形成的一些思考问题的习惯性和知识结构看来需要变一变了。

语言文字学历来被认为是基础科学，但是近年来其中的一些分支学科的应用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实生活深刻变化，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向语言文字学提出了解决种种问题的急迫要求，如一股巨大的浪潮，来势凶猛，出人意料。毋庸讳言，我国的科学技术界和决策层对此思想准备不足，语言文字学界则更是缺乏认识的准备，同时人才结构也不适应这一划时代的新需求。例如，在我国近千所有文科，特别是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高等学校里，能够开设应用语言学课程的很少，设置相关教研单位、招收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的就更少了。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最初只限于对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现在在我国，计算语言学、语言在特定行业中的使用（例如法律语言、广告语言、广播电视语言等）以及母语

(第一语言)教学，也包括在应用语言学之内。语言学界称前一种含义为狭义的应用语言学，称后一种为广义的应用语言学。1997年，原国家教委在修改学科目录时，将“应用语言学”从原二级学科“外国语言学”下的三级学科，改为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学”则与“比较语言学”连在一起)。这一举措包含两种意义：应用语言学正式成为我国高等学校普遍培养多层次人才的一个学科，而不仅限于外国语言教学和研究单位；“应用语言学”的广义性得到了教育部门的正式认可。无疑地，这将对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建设和整个语言文字学界的积极变革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为了加快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建设，近几年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支持筹建了中国应用语言学会，并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组织了面向计算机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开展了全国小学识字教学研究和交流，支持在应用语言学理论和法律语言、广告语言、广播电视语言以及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加快了国家级大型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建设、有关语言文字规范和信息处理方面的规范标准的研制，开展全国性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调查。为了配合上述这些工作，配合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逐步加强，我们编辑了这套《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

最初计划这套丛书共11种，除现在和读者见面的8种外，还有黄曾阳的《概念网络体系理论(HNC)》、于根元的《广告语言研究》和陈章太等的《叫卖语言研究》。黄先生因要集中精力进行该理论在计算机上的进一步完善和尽快使之产品化，所以为本丛书写作的事搁浅；于先生当时有广告语言方面的书问世，认为现在再写一本理论性著作的条件尚未具备，建议从缓；陈章太则因身体一时不适，不能

按时定稿。但是我们觉得,现在的这8种,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主要问题。当然我们仍然期待着黄、于、陈等人的著作能够早日出版。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起语言文字学界朋友们的兴趣,并从中得到一点信息,引发不同意见,一些问题可以由此而得以展开讨论。我们特别希望年轻学子能从中了解到应用语言学发展的必然性和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如果由此而激发了一些人对应用语言学的关心和从事这一“行业”的意向,那就更好了。

丛书中的每一种,都由作者先拟出提纲,我们阅后提出意见;书稿完成后,经我们通读,提出修改意见,再由作者修改定稿。即使如此,书中不够完善之处肯定还有,敬祈读者指正。至于文字风格等完全属于个人的习惯,则不强求一律。

在筹划和出版这套丛书过程中,一直得到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社长黄尚立同志,亲自过问,给予关怀;责任编辑之一的曾大力同志具体策划、编辑,花了很多精力。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许嘉璐 陈章太
1997年12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语言与社会共变	(10)
第一节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11)
一、词汇与社会生活	(11)
二、语音演变与社会的关系	(34)
第二节 新时期汉语词汇变异	(49)
一、新时期词汇变异的四种方式	(50)
二、词汇变异与规范	(81)
第三节 词语的社区差异与社会文化因素的 关系	(86)
一、词语的社区差异给交际带来了许多 不便	(87)
二、内地与港台词语的差异比较	(90)
第四节 新词语与社会生活	(103)
一、人口流动与新词新语	(104)
二、词语政治色彩的退化与社会生活	(108)
三、当前新旧矛盾在新词语中的反映	(110)
四、反腐倡廉中涌现的新词语	(114)
第五节 受特定社会制度制约的称谓语	(118)
一、职业称谓的变化	(118)
二、通称的变化	(120)
三、尊称的变化	(126)

四、夫妻之间称呼的变化	(129)
五、宗法家族观念的淡化	(132)
第六节 专名的时代特征	(136)
一、人名	(137)
二、地名	(146)
三、店名	(157)
 第三章 语言与文化共存	(167)
第一节 汉语词语的文化内涵	(171)
一、词语文化内涵研究的意义	(172)
二、汉语词语的文化内涵	(174)
第二节 汉语句法结构与汉民族思维方式的 关系	(205)
一、汉语句子的“意合法”反映汉人 重意念、重意在言外的思维方式	(206)
二、汉语句子里常常省略主语，体现汉人 不重本体的思维方式	(211)
三、从汉语词序看汉人从已知到未知、从 大到小和顺装的思维习惯	(213)
四、三分和多分的辩证思维在词句中的 反映	(216)
第三节 汉字造字的语言文化心理	(220)
一、汉字造字的语言心理	(220)
二、汉字造字的文化心理	(222)
第四节 汉语方言的文化积淀	(227)
一、如何识别语言和方言	(227)
二、从汉语方言词语看地域文化	(236)
三、汕尾福佬话的文化积淀	(245)
第五节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258)

一、民族语言与自然生态	(259)
二、民族语言与制度文化	(262)
三、民族语言与行为文化	(271)
四、民族语言与观念文化	(274)
第四章 语言与市场经济	(282)
第一节 语言的市场价值	(282)
一、英语热背后的经济利益	(285)
二、扩大语言共同性的经济效应	(287)
三、扩大语言共同性所遇到的问题	(294)
四、语言势力消长的因素	(297)
第二节 市场经济与社会语言学研究	(300)
一、吸收外来词和外来概念词，充分发挥 汉语的吸收功能，以适应开放的市场 经济发展的需要	(301)
二、开放的市场经济是推广普通话的主要 动力	(308)
三、市场经济的独立性与 1997 后香港语言 文字的使用	(310)
四、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当前国内少数民族 的语文生活	(313)
五、市场经济的法制性与语言文字管理 问题	(314)
六、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是提高全民族 说话水平的动力	(316)
后记	(318)
主要参考文献	(320)

第一章

I

绪 论

研究语言可以把语言当作一种工具，研究它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结构系统，这是 100 年来结构主义通常采用的方法。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结构主义语言学风靡一时，这是有当时的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的。五六十年代是思想禁锢的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当政治运动一来，不少语言学工作者都为自己只对语言结构本身进行纯形式描写而感到庆幸。“咬死猎人的狗”这个句子，既可以理解为“人咬狗”，也可以理解为“狗咬人”，管它谁咬谁，都是主动宾句式，讨论这些问题不担风险。于是，语言学界只好把语言当作孤立的静止的现象去描写，紧跟当时美国流行的描写语言学，就语言研究语言，和社会现实挂不上钩。

早在 1967 年，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霍克曾经哀叹当时的“纯形式研究”，认为这不是一个“突破”，而是一

个“崩溃”。^①其所以走向崩溃，大概是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只注重形式描写，不讲实际应用。不过，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它的本体语言学的地位也是不会改变的。从事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人都必须具备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接受它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的训练。

语言不仅仅是一个结构符号系统，而且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着内在的社会原因，而且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含义。就拿改革开放以来的词汇发展来说，它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历史转型的一种结果，反映这一阶段社会历史的特征，让人们感受到时代发展的迅速和历史变革的巨大力量，也反映在历史转型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难以尽如人意和需要认真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因此，语言研究是不应该脱离社会的。

80年代中期，在世界语言学由重结构转向重功能的潮流影响下，在我国文化热的催化之下，中国语言学界出现了一种可喜的现象，那就是打破了长期一统天下的纯形式的静态研究，更注意到对语言的社会文化属性的研究。不管是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还是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都开始注意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或多学科交叉研究。例如现代汉语语法出现了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的研究，表明语法学界从纯形式研究向应用研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我国社会语言学工作者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与社会共变。他们联系汉语实际，既研究汉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引起的历时变异，又研究汉语在不同地域、不同社区所引起的共时变异。人是属于社会的，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程度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都可以使每

^① 王士元主编，游汝杰等译：《语言与人类交际》，中文版序言，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

个人说出来的话有不同的变异。以研究语言变异为中心的我国社会语言学便应运而生，十多年来一步一个脚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同语言集团和社会属性的人走到了一起，人际交往更加频繁，人际关系更加复杂。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就涉及语言形式的选择和内容的表述方式，因而研究语言（包括非语言手段）与人际交往的交际语言学便悄然兴起。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结合文化背景，解释当前或历史上一些语言现象，分析汉语词语和句式的文化内涵，研究中外文化的对比和互相渗透，就成为文化语言学和语言跨文化交际所关注的内容。以上学科都带有边缘和交叉的性质，而边缘的地方通常是模糊不清的，我们不要急于给上述学科划清界限，边缘学科的特点就是界限划不清楚。此外，计算机语言学、话语语言学和语用学等新兴学科的兴起，无疑都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补充和发展，其结果是拓宽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并使这一领域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发的景象。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和拓宽，使得语言学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渐为社会所了解。事实表明，现代的中国语言学已由“出世”语言学开始成为“入世”语言学了。下面以社会语言学为例，讲一讲语言的社会文化研究。

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变异和语言计划（language planning）。这里先简要讨论一下语言计划。语言计划（有人称“语言规划”）泛指“有计划地管理与改进现有语言和文字的活动。它包括语言选择、语言协调、语言规范化、文字改革、文字创制等方面的内容。”^①这些内容都涉及到语言功能的应用。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一律平等，对这一点大家是

^① 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22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有共识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消灭了民族压迫，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各民族不分大小，平等相待。我国政府发行的人民币票面上印有中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就是很好的证明。

建国初期，内地受斯大林《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一书关于语言融合理论的影响较深，不少人认为未来世界各民族的语言必不可免会融合为一种世界共同语，未来的中国语言也将融合，出现单一共同语的制度。50年代初期，国内有些文章曾有过“逐渐消灭方言”的提法：

方言对于民族共同语的贡献逐渐减少，方言本身在民族共同语影响之下也将逐渐萎缩而终于消灭。但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并不以方言消灭为条件，这两件事情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①

以一千年来作政治中心现在还是政治中心的北京的方言为核心的北方方言系统，由于散布地区的宽广已在各方言中取得扩展的必要基础。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基于这个事实，其他方言便只有退居于附属地位而逐渐走向消灭。^②

推广普通话是不是一定要消灭方言？如何消灭？“乡音无改”的人是不是就一定不会说普通话？普通话与方言能否长期共存分用？当时大家都是不太明确的。尽管五六十年代推广普通话比较顺利，成绩也很显著，但由于个别地方和个别人有强制推广普通话而压制方言的倾向，十年浩劫之后，推广普通话遇到了一些阻力，不能说跟当年没有正确摆正方

^① 罗常培、吕叔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载《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上册，8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

^② 邵荣芬：《统一民族语言的形成过程》，载《汉族的共同语和标准音》，21~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言的位置无关。

改革开放初期，内地一再强调推广普通话并不排斥方言，更不是要逐渐消灭方言，诚如吕叔湘先生 1983 年在全国“注提”会上的题词里所说：“你说话，我说话，会说方言，会说普通话。”^①80 年代中期，国内开始引进西方的双语理论，摒弃斯大林关于语言融合的学说，认为在未来世界里，人们都有极高的科学文化水平，除掌握本民族语言外，还能操几种通用语，没有必要统一在任何一种世界共同语的旗帜下；未来的中国更不可能通过消灭方言而实行只有全国通用语的单语制。未来的世界和中国都是多元社会，也是双语、多语和多方言的社会。双语、双方言和多语是新时代的潮流，它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团结和进步，有利于现代化。双语、双方言和多语社会并不是这个“语”吃掉那个“语”这个“言”，而是彼此协调发展，共同为社会服务。中国这个双语、双方言和多语社会是迫切需要全国通用语普通话的。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地位平等，不分主从；普通话与方言的地位却是有主有从的。方言区应以普通话为主导，普通话既在方言之中，又在方言之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于 1986 年正式提出“普通话与方言并存分用”的方针，这比“不要消灭方言”的提法更加主动积极，它消除了不少热爱方言母语的人的疑虑，促使大家更加努力学习普通话。所谓“分用”，是指使用领域说的。国家规定普通话用于全国范围和正式场合，使普通话逐步成为工作用语、教学用语、宣传用语和社会用语。在正式场合如果不使用普通话，人们有进行干预的权利。然而在非正式场合下，选择普通话还是方言，人们一般没有权利干

^① “注提”是“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意思。此项小学生识字教学方法当时在黑龙江实验成功。

预。所谓“共存”，一般包含了“长期”的意思。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里多姿多彩的文化靠方言反映出来，方言里的某些特有说法相当简洁、生动、传神，用不着使用普通话的长串解释。在现代社会里，方言仍然可以很好地为当地居民服务。今天，某些强势方言(如粤语)的有用成分不断地渗透到全国，弥补了普通话的某些不足，我们更没有必要消灭方言了，而且方言是消灭不了的。既然这样，普通话与方言就需要长期共存，互相融合。也有个别地方存在三四种方言，可是没有一个方言比较有权威，结果是谁也不服谁，当地居民谁也不学谁的话。其中，不少人宁愿绕过邻近的方言而选择普通话进行交际。福建中部一部分地区就是如此。由此可见，在与方言长期共存分用的方针指引下，普通话的地位将会越来越高，它的使用范围将越来越大，对方言的融入将越来越深。

在 50 年代提出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中，除上述推广普通话外，还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和推行简化汉字。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从它产生那天起，简化汉字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汉字简化是符合历史潮流的。50 年代简化汉字主要是为了降低汉字的繁难程度(简化 2235 个字)，有利于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从整体看，简化是成功的。简化字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文化、教育、科技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简化字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早已扎下了根，而且它的影响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受到海外侨胞的欢迎，联合国还把中国简化字定为中文的规范字体。然而，毋庸讳言，参与制定汉字简化的一些文改“激进派”，有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想法，错误地认为汉字简化得越多越好，因而片面追求减省笔画，减少字数，较多地采用同音代替、合并简化和偏旁兼职过多等简化方法，导致多义字、多音字和形似字增多，容易产生写错字、看错字、读错音等错

误。1977年12月全国报刊上又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分两表公布,第1表公布248个字)。由于社会各界表示不欢迎,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明令宣布废止,并指出“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

目前,台港澳地区仍使用繁体字。只要将来时机成熟,彼此克服对抗情绪,抛弃成见,从维护国家统一和计算机科学发展的需要出发,在繁简字两端取中庸之道,经过平心静气的讨论,内地可以往后退一步,台港澳可以往前进两步,一定可以使汉字形体逐渐缩短距离,趋于统一。

语言的社会文化研究具有较强的人文性和社会性,难度较大。一方面,反映社会文化现象的语言事实难以发现;另一方面,对事实做到准确的解释也很困难。例如近百年来“红”可以表示革命,“白”可以表示丧事,究竟这是汉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就必须懂点中西方文化对比的知识(下详)。由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和解释的角度多样性,要想说清楚汉民族为什么喜欢红不喜欢白,那就更不容易了。据笔者所知,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已有三种解释:(1)红跟太阳有关,它给世界带来温暖和生机,所以红是吉祥的象征,表示喜事;白可能跟洪水有关,闹洪水时白浪滔滔。周武王伐纣时曾竖起白旗,意思说商纣王荒淫无道,上天将降大灾大难给他。因此,白是不吉利的象征,表示丧事。^①(2)与古人的阴阳五行有关。红指东方,东方生机勃发;白指西方,西方有主杀的白虎星。(3)与性民俗有关。红色象征着性潜能、生命和光明;白色象征着性能力的低下,死亡和悲伤。^②上述哪种解释比较

^① 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16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② [荷]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7~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